

北京方言浅说

□张伯江

北京话对中国人来说谁都不陌生,因为它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但北京话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通话,它也是一种地区性的汉语方言,跟其他汉语方言一样,有它自己形成的历史,有它不同于其他方言的特色,并且有它独特的文化价值。

一 年轻的汉语方言——北京话的历史

跟那些给人印象深刻的典型方言比,像福建一带的闽方言,广东一带的粤方言,江苏一带的吴方言,山西一带的晋方言等,北京话并不像它们那样可以追溯出上千年的历史,北京话其实是一种相当年轻的汉语方言。从唐代到辽、金,北京一直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更曾经成为金、元、清三个非汉族建立起政权的首都,不同民族人口变化之大可想而知。北京地区千百年来虽然一直还是说汉语,但是“和外族语言长期密切接触,和广大中原地区的本族语言反而关系疏远”(林焘《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造成北京话历史上长期处于大变动中的局面,拿最后两个封建皇朝明代和清代来说,明朝北京地区的“官话”带有浓重的南方色彩,而清朝的北京“官话”则更多地带有东北地区汉语方言的特点。

当代北京话的直接源头应该追溯到清代。清初八旗兵进驻北京,实行满汉分居的政策,北京城内原来居住的汉人大多被赶到外城,城内则

由八旗兵和他们携带来的家眷、奴隶等居住。外城的大量汉族北京人说的是相对旧些的北京话，即经元、明两代形成的流行于北京地区的方言；而内城八旗兵带来的方言，则是他们在入关以前习惯说的在东北地区长期流行的一种汉语方言，这种方言的源头其实也在北京，是辽、金时期在燕京地区形成的广泛通行于幽燕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汉语方言。明代的北京地区，随着明政权北上，主流方言面貌大变，辽、金时期的幽燕方言便主要在东北地区发展了。当清朝八旗兵带着这种方言进京以后，很快就形成了崭新的一种北京内城话。这种“内城话”由于跟“外城话”有共同的来源，交流起来并不困难，清代中叶以后，内外城交融日益频繁，就逐渐形成了现代北京话的大致面貌。

从这个历史可以看出，北京话的发展史是比较独特的。不像多数汉语方言那样相对独立地发展，而是始终处于政治变动的大背景下，跟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不断接触中发展起来的，从清代中叶至今，不过三百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北京话是个年轻的汉语方言。

二 “油腔滑调”——北京话的语音特色

很多人说北京话是“油腔滑调”，也就是说，北京话在语音方面还是让外地人感到有些不同于普通话的地方的。最明显的是北京话里“儿化韵”的词语特别多。很多普通话不儿化的词，在北京话里总要说成儿化的才自然，例如普通话的“事、玩、花、小孩、媳妇、茶几、一点、靠边”，北京话要说成“事儿、玩儿、花儿、小孩儿、媳妇儿、茶几儿、一点儿、靠边儿”。这样的例子很多，对于非北京人来说，也许并不影响交际理解。但是，北京话的儿化词还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这一点就是非北京人难以了解的了。比如儿化词“白面儿”指的是毒品海洛因，而不儿化的“白面”指的是小麦磨成的面粉；“百岁儿”指的是婴儿诞生一百天，而“百岁”指的是老人活到了一百岁；“宝贝儿”用来称呼人，是一种对小孩子的爱称，而“宝贝”则不指人，专指物件；“信儿”是消息的意思，“信”则是信件；“印儿”是痕迹的意思，“印”则指的是印章；“抽筋儿”是说肌肉发生痉挛，而“抽筋”则是说抽去肌腱；“跟脚儿”是“随即，马上”的意思，而“跟脚”则是说鞋穿在脚上大小正合适；“起火儿”是着急、发脾气的意思，而

“起火”是生火做饭的意思，等等。

北京话的儿化韵会使原来不同音的词变成同音的。比如“小棍儿”跟“小柜儿”成了同音；“(刀)把儿”跟“(花)瓣儿”成了同音；“小袋儿”跟“小蛋儿”成了同音；“(茶)几儿”跟“(连)襟儿”成了同音，等等。其实北京话不一定是儿化字眼儿最多的方言，比如四川有些方言里儿化现象也不少，但是上述这种儿化以后偏离了原来意思的现象，倒是北京话的一大特色，也是非北京人常常觉得北京口语“油腔滑调”的原因之一。

北京语音跟普通话的差别还显现在某些声调上。除了跟普通话一样，两个第三声的字相连第一个字会发生变调现象(如“有水”跟“油水”同音，“马脸”跟“麻脸”同音)以外，在一部分北京人嘴里，两个第四声的字相连，第一个字也会发生变调，变成第二声，例如“大队”听起来像是“达队”，“过去”听起来像是“国去”，“唱戏”听起来成了“长戏”，等等。在相当一部分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嘴里，这几乎成了规律，据调查，下面这些词都有把第一个字读成第二声的：电线、注意、逗乐儿、饭铺儿、扣肉、立夏、剩饭、现在、树叶儿、弟妹、碍事、受罪、毕业、教授、故意、最近、瘦肉、算卦，等等。

其实北京话的语音，除了“油滑”的一面，还有相对“笨拙”的一面，比如在北京的不少地方，“安”要读成nān，“爱”要读成nài，“藕”要读成nǒu，“恶”要读成nè。虽然北京城区很少出现这样的读音，但是在京郊相当广的区域内都有这样的读法存在。

三 “满嘴里跑舌头”——北京话的词汇特色

北京话的口语词汇也是相当丰富而生动的，这在历来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小说作品里都留下了不少记录。例如老舍小说里的“越说越拧葱”(《赵子曰》)；“饶世界胡塞”(《骆驼祥子》)；“如今晚儿天天查户口”(《龙须沟》)；“到我的事情上了，给我个干搭台”(《骆驼祥子》)；“他也不敢太离格儿了”(《四世同堂》)；“要是拿钱晃我，我可是眼急”(《老张的哲学》)；“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更体面”(《茶馆》)；“买车也得悠停着来”(《骆驼祥子》)，等等。

北京话的这些口语词，有的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来历，但更多的是在

日常使用中创造的。北京话的造词是不拘一格的。利用儿化造词就是特别能产的一种手段,比如动词“蹭”儿化后成了名词“蹭儿”,表示该花钱而不花钱的享受(吃蹭儿,听蹭儿);动词“讲”儿化后也成了名词,意思是含义、道理、规矩等(这个词什么讲儿?这里头有什么讲儿?);动词“落”儿化后为名词“落儿”,意思是着落、生计(有落儿没落儿);动词“盼”儿化后为名词“盼儿”,意思是希望、盼头(有了盼儿了);动词“咬”儿化后变成名词“咬儿”,意思是饭食(有咬儿没咬儿);动词“嘬”儿化后变成名词“嘬儿”,是乳头的意思(吃嘬儿),等等。

北京口语的形容词也有一些生动形式,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形容词后边带有多种没有实际意思的词尾。例如:蔫不唧的、软不搭的、酸不拉的、甜不唆的、美不滋儿的、玄的乎儿的、猛咕丁的、粘咕拽的、灰不唧唧的、咸不唆唆的、软咕囊囊的、滑不出溜儿的、白不吡咧的、黄不拉嚓的、瘪不拉唧的、苦不唧嘹的、直不棱登的、脏不溜秋、臭拉巴哄的,等等。

北京话还有一些特殊的构词法。比如名词重叠以后成为动词:“梗梗”,意为直挺着脖子,不服气(小脖子一梗梗,眼珠子一瞪);“祸祸”,是糟蹋的意思(别把那盆干净水祸祸了);近似的例子还有“咧咧”,是胡说乱讲的意思(别听他在这儿瞎咧咧);“呛呛”是争吵的意思(他们在这儿呛呛半天了)。

四 京腔京韵——北京话与北京口头艺术形式

每个地方都有基于当地方言的口头艺术形式,最常见的是戏曲和曲艺等说唱形式。说到北京,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京剧、京韵大鼓等艺术形式。那么,京剧究竟是不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形成的呢?这个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京剧很明显用的不是北京话。首先,京剧很多字发音的声母跟北京话不一致,比如“尖”要读成ziān,“将”要读成ziàng,“姐”要读成ziě,“青”要读成cīng,“先”要读成siān,“相”要读成siāng,等等,这是河南等地方言的特点,非北京话所有。其次,京剧很多字的韵母也跟北京话不一致,例如“雷”读成luéi,“内”读成nuéi,“鞋”读成xiái,“街”读成jiāi,

“哥”读成gō,“可”读成kǒ,“梦”读成mǒng,“朋”读成póng,“荣”读成yóng,等等,这都是其他方言里某些读音的反映。此外,最明显的就是京剧念白的声调了,显然不是北京话,但是仔细听来又不是任何一种方言的声调系统。事实上,京剧起源于安徽和湖北,早期这两地的艺人难免把自己的方音带入戏曲演唱中,很多人说京剧是“湖广音”,指的就是早期湖北籍艺人方音在京剧里的某些印记。但是京剧毕竟在北京生长了二百多年,从事京剧表演的艺人又不都是湖北籍的,在北京发展过程中,京剧较多地吸收了北京音的成分,同时吸取了昆曲和其他地方戏的成分,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体系,为北方多数人所接受。因此,说京剧是北京的代表艺术形式这话不错,但是京剧的语音却不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

北京的地方说唱曲艺形式以“京韵大鼓”最有名,有人顾名思义以为它必定是以北京音韵为基础的一种歌唱,其实也不尽然。这种艺术形式最早也不是形成于北京,而是在河北沧州一带民间产生,又结合了河南的木板大鼓形式形成的,所以最初也不是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后来这种说唱艺术在天津和北京得到较大发展,早期最有影响的艺人又较多地从京剧的旋律吸收营养,于是京韵大鼓就成了一种广泛融合了京、津两地方音以及泛京、津地区的河北语音和京剧字音的独特声韵系统,也是一种基本不依赖于某种方言的独立的艺术语音系统。

纯粹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发展起来的曲艺形式以北京琴书为比较典型,但是由于过于恪守北京字音,其艺术表现手段反倒不如京韵大鼓等其他曲艺形式那么灵活多变,影响力也就有限一些。就像并不以上海话为基础的越剧成了最受上海人欢迎的地方戏一样,北京人选择京剧、京韵大鼓等艺术形式,并不完全是因为方言的认同,更主要的是对其艺术表现力的认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